

江淮地域与隋炀帝的政治生命

何 德 章

隋炀帝杨广利用隋文帝分立诸子而坐镇江都10年的时机,收纳江淮人士与江南佛道人物,阴谋夺嫡,并有割据江淮的政治图谋。炀帝即位以后,一反文帝朝的统治方略与用人政策,重用藩邸旧臣,信重江淮人士及江淮人组成的军队,从而造成政治上的纷争。炀帝在隋帝国崩溃之际逃亡江都,正是因为他借重江淮人所致,而其阵营内部关陇人和江淮人之间的矛盾,最终造成了他身死国亡的悲剧。

一、江淮人士与晋王杨广夺嫡之谋

《隋书》61《郭衍传》:

(晋)王有夺宗之谋,托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谋事果,自可以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阴共计议。……衍又诈称桂州徼反。王乃奏衍行兵讨之,由是大修甲仗,阴养士卒。

时晋王杨广为扬州刺史,统领江淮四十四州,欲夺太子之位。杨广与心腹郭衍所谋之计,当即为夺嫡不成,便“据淮海,复梁、陈之旧”,建一偏安割据政权。否则,勿需“大修甲仗,阴养士卒”了。

杨广夺嫡之谋,实由于其父隋文帝的统治策略所致。文帝取周建隋以后,为巩固其政权,分封诸子以为屏藩。《隋书》62《元岩传》:“高祖初即位,每惩周代诸侯微弱,以致灭亡,由是分王诸子,权侔王室,以为磐石之固。”开皇元年,即以第四子杨秀为蜀王、益州刺史,总管22州诸军事;开皇三年,以第二子秦王杨俊为秦州总管,“陇右诸州尽隶焉”;开皇十七年,又以第五子汉王杨谅为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①。

开皇九年灭陈之后,文帝以秦王俊为扬州总管,总领淮河及长江以南44州军事,镇广陵。次年,江南豪族群起反隋,文帝又改调平陈隋军统帅、次子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镇于江都,每岁一朝”^②。由皇子充任的扬州总管有统辖江淮各州总管之责。《隋书》64《杨异传》:异为吴州总管,文帝令其“每岁一与(晋)王相见,评论得失,规讽疑缺”。从开皇十年到夺嫡成功,杨广坐镇江都达十年之久。

出镇宗王为扩大势力,纷纷收纳失意沦落之士,笼络地方人物。《隋书》57《薛道衡传》:薛道衡因事配防岭南,“晋王广时在扬州,阴令人讽道衡从扬州路,将奏留之。道衡不乐(晋)王府,用汉王谅之计,遂出江陵道而去。”《旧唐书》72《虞世南传》:虞世南于陈亡后入长安,“时炀帝在

藩，闻其名，与秦王俊辟书交至。以母老固辞，晋王令使者追之。”梁将王僧辩子王岐与原陈将萧摩诃“俱不得志，每郁郁思乱，并为（杨）谅所亲善”^⑨。因此，诸王出镇并未实现文帝巩固隋帝国的初衷，反而使新的统一政权面临深刻的危机。杨秀在蜀，“车马被服，拟于天子”，“重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宫，妄说禾乃之名，以当八千之运”；杨谅在并州，“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遂“阴有异图”；杨俊亦因“违犯制度”受谴^⑩。杨广既居广陵这个“叛乱之地”^⑪，拥有监督江淮44州的权力，遂“阴有夺宗之计”^⑫。他以心腹宇文述、郭衍分别为寿州总管和洪州总管，加强对江淮地区的控制，并于宫内联络宣华夫人陈氏，“规为内助”^⑬。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产生了“据淮海，复梁、陈之旧”的政治密谋。

要以江淮为依托，伺机夺取全国政权，杨广除需笼络杨素、宇文述等关陇集团中的实权人物外，还得广纳江淮人士以为势力基础。当时全国在分裂割据数百年后刚实现统一，地域观念极为浓重，诸将亦多私兵扈从，要控制一个地理区域以扩张势力或为割据之基，关键在于任用当地人士，否则无以同控制政权的关陇集团抗衡。北周末，尉迟迥起兵相州，关东州郡群起响应，众至数十万，“洛阳人梁康、邢流水等举兵应迥，旬日之间，众至万余。……（洛州刺史元亨）乃选关中兵，得二千人为左右。”^⑭后杨广初即位，杨谅于并州起兵，其谋士王岐说：“王所部将吏家属尽在关西，若用此等，即宜长驱深入，直据京师，所谓迅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宜任东人。”^⑮地方势力是其时政治斗争中举足轻重的因素，杨广无疑明白这个道理。

作为灭陈隋军统帅，灭陈之后，杨广处置得宜，“天下称贤”^⑯，江南人士对他并无恶感。他在镇压随后江南豪族叛乱时，以原陈太学博士、南狱正陆知命为“三吴之望”，“召令讽谕反者。知命说下贼十七城，得其渠帅陈正绪、萧思行等三百余人。”^⑰可见，江南豪族是愿意与这位灭陈统帅合作的。

坐镇江都时期，杨广竭力收罗不得志于新朝的江南人士。《隋书》58《柳谿传》称杨广“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余人以充学士”。晋王府收罗的百余学士中，颇多江南人。诸葛颖原籍建康，仕梁至邵陵王记室参军，梁亡入北齐官至太子舍人，后入周，“不得调，杜门不出者十余年。……清辩有俊才，晋王广素闻其名，引为参军事，转记室。”^⑱虞世南出会稽余姚，父寄为陈中书侍郎，世南陈末为西阳王友，其为杨广辟征事前已述及。《隋书·文学·王胄传》：王胄出江东一流高门琅邪王氏，父详为陈黄门侍郎，胄仕陈至东阳王文学，“及陈灭，晋王广引为学士”。同传又称其兄王春仕陈至太子中舍人，“陈亡，与胄俱为学士。”当亦入晋王府。朱瑒本亦江南人，仕梁至骠骑府仓曹参军，或出吴郡钱唐，陈时因事奔北齐（见《北齐书·王琳传》）。此外，会稽余姚虞绰仕陈为永阳王记室，“及陈亡，晋王广引为学士。”^⑲原陈宣惠记室颍川庾自直，“陈亡入关，不得调，晋王广闻之，引为学士。”^⑳他们都是江南地方大族的代表。《隋书·隐逸·徐则传》：则出江南大姓，隐居天台山，“晋王广镇扬州，手书招之。”徐则欣然赴江都，“为王者师”。同传又称：“时有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亦行辟谷，以松水自给，皆为杨帝所重。”江总陈末为尚书令，入隋拜上开府，《陈书》本传称他于开皇十四年卒于江都，当亦游于晋王府第。杨广夺嫡事秘，江南人士虽荟萃于晋王府，史籍中却没有留下他们参与杨广“夺宗”之计的具体事例。不过，他们确曾为其大张声势。《隋书·文学·潘徽传》记杨广于“宣条暇日，听讼余晨”，召集其网罗的文士，编撰了120卷的《江都集礼》。是书必然将梁、陈所行朝典旧仪搜罗备至。吴郡潘徽以扬州博士的身份预其事，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称它“取方月数，用比星周，军国之义存焉，人伦之化备矣”，并对杨广的文德武功及“收杞梓之才，辟康庄之馆”的作法备加颂扬。在江南亡国士人看来，杨广在江都的总管府，实际上是一个保护他们利益的小朝廷。

杨广在江都，还扮演了江南佛、道保护者的角色。他与括州、潭州、婺州等地的名僧交往极为频繁。隋释灌顶所撰《国清百录》，记录天台宗名僧智凯等人与陈、隋皇帝往来文书百余件，其中与杨广有关的就占了60多件。杨广向江南名僧恭执弟子之礼，为他们重建毁于战火的庙宇，并于江都“立宝台经藏，五时妙典，大备于斯”^①。又置四道场，“国司供给，释、李两部，各尽搜扬”^②。江南名僧靖嵩、智矩、辩义、法侃、吉藏、慧觉、智琰、慧乘等都被召入其中的慧日道场。慧乘出彭城刘氏，祖为梁直前将军、琅邪太守，父刘雅为陈兵部郎中，他本人出家后，与陈桂阳王陈伯谋，侍中、吏部尚书毛喜，尚书左仆射江总等过从甚密，杨广召之入慧日道场，号为“家僧”。后慧乘随杨广入朝，多次受到隋文帝的接见，杨广让他尽意而言，“言论不有见尊致结”，以便使文帝知“慧日创立，搜扬一化，并号龙象，咸闻义门”。慧乘既得杨广暗中嘱咐，遂“纵辩无前，折关陈款，皆倾巢穴，甚称王望”^③。最迟不过开皇十九年，杨广又于京城长安创日严寺，分慧日道场名僧前往，“供由晋国”^④，“欲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壤”^⑤，结果吉藏以其才学折服号称“三国论师”的关中名僧僧粲，“轰动京师，士众闻风，造者万计。齐王暕召讲，京辇英彦相从，前后六十余人。”^⑥仁寿二年，并州总管杨谅“欲炫其智术”，遣河北名僧志念往长安主持法会，“致使三辅高哲，或废讲而同师焉”。日严寺僧辩义复加辩难，前后三日，使志念“杜词莫对”^⑦。这些江南名僧为杨广折冲尊俎，光其身价，无疑增强了崇信佛教的隋文帝立他为太子的决心。而且，江南名僧亦即名士，与梁、陈统治上层人物往来频繁，颇具社会影响，因此也有利于杨广在江淮地区培植势力。

在引用江南人士实施立脚于江淮的“夺宗之谋”时，杨广对江南人士及江南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他即位之初，内史舍人窦威等撰《丹阳郡风俗》，“以吴为人东夷”，杨广大为不悦，令杖责窦威等人，让江南人虞世基等修《十郡志》以代之。在责让窦威等人的敕文中说：“昔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以称人物。故晋武帝云：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华夏衣纁，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尔等著其风俗，乃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于尔等可乎？”^⑧

杨广江都“藩邸”对江南人士的借重，以及他“据江淮，复梁陈之旧”的政治图谋，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用人政策并决定了他的最后归宿。

二、炀帝朝江淮人士的进用

隋文帝虽用武力实现了全国统一，却没有象西晋武帝灭吴之后那样，从政策上探讨和解决江南地区“易动难安”的问题，而是在江淮广设总管府，实施武力控制，并多次下令收缴舰船武器，以求减少江南豪族反抗的可能性。

灭陈之后，文帝也没有象西晋对待蜀、吴皇室那样，安抚陈宗室，以消除其反侧之心，直到开皇十四年，才允许陈后主叔宝“修其祭祀”^①；陈宗室诸王“并配于陇右及河西诸州，各给田业以处之”，使他们不得不“佣保为事”^②。

而且，全国虽已一统，政权却由关陇人士把持，“尚关中旧意”^③，西魏、北周时的官爵仍可荫及后代。江南人被视为蛮夷，在重臣苏威等江南人士学业、世务二者不得兼得的论调下^④，他们更难求仕进于新朝。文帝因裴蕴“夙有向化之心”而“超授仪同”，便受到高颖的坚决反对^⑤。号为“南金之贵”，当代潘、陆的虞世基任通直郎，“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怏怏不平，尝为五言诗以见其意，情理凄切，世以为工，作者莫不吟咏。”^⑥前陈吏部侍郎沈君道陈灭后徙居长安，家甚穷，与其子“并佣书为业”^⑦。江淮人士遭遇既如此，遂奔走于出镇宗王府邸，王岐、萧摩诃竟

因“不得志”而“郁思乱”。

炀帝即位以后，开运河，营东都，筑长城，巡视各地，一反文帝分置宗王的作法，竭力通过皇朝的权威维系帝国的统一。他还于大业五年下令：“魏、周之官不得为荫”^⑧，尽量作出统一政权向各方人士开放的姿态，但他在江都的经历却影响着他的用人政策。对昔日不附己者，炀帝深为忌恨。李百药为关东士人领袖李德林之子，“炀帝恶其不附己，以为步兵校尉，大业末，转建安郡丞。”^⑨薛道衡曾“不乐王府”，炀帝时，上《高祖文皇帝颂》以邀恩，却被斥为讥讽当朝而见杀。炀帝所真正信任的是“藩邸”旧臣及江淮人士。

宇文述、郭衍是炀帝旧时心腹，炀帝即位之际，让二人领东官兵，“帖上台宿卫，门禁并由之。”即位以后，宇文述与苏威对掌选举，参预朝政，“委任与威等，其亲爱则过之。”“凡述所荐达，皆至大官。”^⑩郭衍则为右武卫大将军，炀帝巡幸江都，让他统帅左军，并说：“唯有郭衍心与朕同。”^⑪大业二年七月，炀帝“擢藩邸旧臣鲜于罗等二十七人官爵有差”。^⑫《隋书·文字·虞绰传》：绰先为晋王府学士，大业初转秘书学士，为校书郎，“以藩邸左右，加宣惠尉，与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诏，恩盼隆洽。”同书卷56《张衡传》：衡“以藩邸旧臣，恩宠莫与为比，颇自骄傲。”大业末，各地官吏或起兵反隋，或拥兵自重，但昔经“藩邸”者仍效忠于炀帝。李渊率军入关中，阴世师留守长安，“自以世荷隋恩，又藩邸之旧，遂勒兵自守。”^⑬尧君素在河东，“亦自知不济，每言及国家，未尝不歎歎。谓将士曰：‘吾昔事主上于藩邸，大义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终，自当断头以付诸君，听君等持取富贵。’”^⑭

“藩邸”之中，本多江淮人士，炀帝在藩时对梁、陈旧域的重视以及他对江南人士的好感，也使他一反文帝朝的用人政策，大量起用江淮人士。

首先，原陈宗室的政治地位有了巨大改变。《陈书》28《陈伯山传》：“大业二年，隋炀帝以后主第六女嫔为贵人，绝爱幸，因召陈氏子弟尽还京师，随才叙用。由是并为守宰，遍于天下。”据《陈书》统计，大业中，陈宗室子弟得为县令者21人，郡守、通守者7人，郎官4人，卿5人。修史者将陈氏子弟命运之巨变系于一女子之得宠，却不能解释这样一个事实：隋文帝时，陈宣帝女宣华夫人陈氏为隋文帝宠幸，“后宫罕得进御”，^⑮却并没有给陈氏子弟带来什么政治上的好处。显然，陈宗室地位的变化是执政者政策变化的结果，征用陈氏子弟与擢藩邸旧臣发生在同一年中，更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江淮人士得参与隋之高层政治。文帝时贫困落拓的虞世基深为炀帝信任，“帝爱其才，亲礼愈厚，专典机密，与纳言苏威、御史大夫裴蕴等分掌朝政。”^⑯裴蕴在文帝时得仪同虚号而为高颎所阻，在炀帝时却能与苏威等共执朝政，“参掌机密”^⑰。姚察陈亡入关，文帝盛赞其“学行当今无比”，却不受重用，“炀帝初在东宫，数被召见，访以文籍。即位之始，诏授太子内舍人，余并如故。车驾巡幸，恒侍从焉。及改易衣冠，删正朝式，切问近对，察一人而已。”^⑱江南人许善心也极受炀帝信重，虽多次直言忤旨而罢官减品，但当炀帝于大业末被突厥围于雁门而虑肘腋之患时，却让他“摄左亲卫武贲郎将，领江南兵宿卫殿省”^⑲。足见炀帝对江南人士及江南人组成的军队的信重。

与此同时，许多江淮文士被征召入长安供职。《隋书·儒林·褚辉传》：“炀帝时，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由是擢为太学博士。”此次征召尤以文帝时未能入选之江南儒士居多。《儒林传》又有余杭顾彪、鲁世达，炀帝时分别为秘书学士、国子助教。据《新唐书·儒学传上》，二人与东海包恺、徐旷均因许善心举荐而被征，褚辉亦如是。炀帝时还有苏州人陆元朗为秘书学士，朱子奢为直秘书学士（均见《新唐书·儒学传》）。同传又称扬州江都人曹宪“仕隋为秘书学士”，潭州临湘人欧阳询“仕隋为太常博士”，应均与炀帝之召有关。明陈霖《正

《隋南康府志》6《人物志》“建昌县”条：“隋凌恭，字遵德，精通五经，而埋名晦迹。杨帝时召为学士。”南宋《咸淳毗陵志》16《人物志》：“唐高智周，父子长，仕隋为秘书学士。”杨帝时众多江淮人士应召入长安，居官任职，与其“自平陈之后，硕学儒儒，文人才子”皆由江南而至的观念有极大关系。

其三，培植、信任江淮人组成的军队。杨帝即位后，高级将领中江淮人骤增。始兴人麦铁杖，陈亡徙清流县，后于平定江南豪族举兵有功，杨素特奏授仪同三司，然“以不识书，放还乡里”。杨帝即在位之始，即授以右屯卫大将军之职，“待之愈密”。于是，铁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怀竭命之志”^⑨。江都人来护儿亦从右御卫将军升为右骁卫大将军，“帝甚亲重之”，后转右翊卫大将军，三次伐高丽，来护儿均为水军统帅^⑩，足见杨帝对他的信任。陈将周罗暉在文帝时为太子右卫率，杨帝即位，擢升为右武侯大将军，以副统帅之职讨汉王杨谅在并州的叛乱，亦极亲信。大业六年，杨帝命庐江陈稜与岭南人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人远击琉球，事后，陈稜常领兵宿卫。

不仅江淮人士多为高级将领，而且在大业时，杨帝信重的军队中亦多江淮人。《资治通鉴》唐武德元年七月条记：宇文文化及与李密相持，“其将陈智略岭南骁果万余人，樊文超领江淮排獍、张童儿帅江东骁果数千人，皆降于密。”“岭南骁果”、“江淮排獍”及“江东骁果”能在一位将领带领下集体哗变，显系独立为军。杨帝在江都生聚十年，“大修甲仗，阴养士卒”，当容纳了不少江淮人组成自己的亲信部队，而此条所记岭南及江东骁果等，应是大业中新近组编的。据《全唐文》1《授张镇周、陈智略淮南行军总管诏》，知陈智略为“岭南首族”，故得以在大业末统帅岭南骁果。《新唐书·南蛮下》“南平獍”条称：“有宁氏，世为南平渠帅。陈末，以其帅猛力为宁越太守。陈亡，自以与陈叔宝同日而生，当代为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瘴不能进。猛力死，子长真袭刺史。及讨林邑，长真出兵攻其后，又率部落数千从征辽东。杨帝召为鸿胪卿，授安抚大使，遣还。又以其族人宁宣为合浦太守。”此事又见于《隋正义大夫宁贇墓志》^⑪，志中“长真”作“长贞”。贇为长真之弟，大业二年十月入朝，授开府仪同三司，同年改为正义大夫。宁猛力与其子在文、杨二朝不同政治动向，反映了两朝政治尤其是用人政策对岭南豪酋的不同影响，而长真“悉部落数千从征辽东”，说明他是带领部落兵集体应募的，当如陈智略一样，一直拥有对部下的指挥权。麦铁杖战死辽东后，其子麦孟才被杨帝任命为武贲郎将，“领江淮之众数千人”^⑫，亦属类似情况。正因江淮人独立成军，且为杨帝信重，当他身围雁门时，才会让江南人许善心“领江南兵宿卫殿省”。

当然，隋杨帝亲信任用江淮人士，并没有给他们一条正常的入仕途径，只是宠幸其中部分与他有接触的人而已。虞世基、裴蕴、袁充等人行迹近于恩幸，可以说，他们之被重用，除了杨帝在江都十年的经历对其用人政策的影响外，虞世基等亡国之臣因缘附会，邀幸主恩，也正符合“恃其俊才，矜矜自用”的杨广的口味^⑬。

杨帝信任藩邸旧臣及江淮人士，使文帝时在高层政治中处于排它地位的关陇人士受到排抑，这使大业时期的高层政治孕育着深刻的危机。大业三年，文帝时的重臣名将高颎、贺若弼、宇文弼，皆因“谤讪朝政”之非被杀^⑭，杨帝得以夺嫡的重要支持者杨素也因权势太重而受猜忌，后素子杨玄感“内不自安，遂与诸弟潜谋废帝”，及其于大业九年举事后，“署官属，皆准开皇之旧。移书旁郡，以讨（来）护儿为名，各令发兵。”杨玄感在给别人的信中指斥杨帝朝“朋党相扇，货贿公行，纳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⑮。关陇人士有很多参与了这次叛乱，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开皇、大业两朝政治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关陇人士与江淮人士之间的矛盾。

而且，杨帝“藩邸”之中也有关陇人士和江淮人士两个部分，杨帝即位以后，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日渐尖锐，这在《隋书》58《许善心传》中有较集中的反映。这种矛盾最后导致了关陇人士与

“南人”兵戎相见，为炀帝身死国灭埋下了祸根。

三、析炀帝第三次幸江都

大业十一年八月，炀帝出巡塞北，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这标志他维护帝国统一的努力彻底失败。之后，他脱身至太原，“议者多劝帝还京师，帝有难色。”遂从宇文述之议而到洛阳。次年七月，炀帝又执意向江都进发，并先后杀请还长安的奉信郎崔民象、王爱仁。事见《隋书》61《宇文述传》及《炀帝纪下》。唐朱敬则著《隋炀帝论》，对此大为不解，故解释说：“岂不是色醉其心，天夺其鉴，窜吴越以避其地，虚宫阙以候圣人，盖为大唐之驱除也。”^⑧时至今日，从享乐出发议其事者亦多有其人。

炀帝对回长安“有难色”，《隋书·五行志》有一段材料足以表明他当时的心情：

大业十一年，炀帝自京师（按：“京师”当作“太原”）如东都，至长乐宫，饮酒大醉，因赋五言诗，其卒章曰：“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令美人再三吟咏，帝泣下沾襟，侍御者莫不歎歎。帝因幸江都。

从此可以看出，炀帝辞别两京南下江都时的心情是极沉痛的，并非“色醉其心”，而是在求归不得的情况下作出的理智决策。

首先，炀帝南下江都是他在巩固隋帝国失败后一种必然选择。炀帝在江都有过十余年的辉煌时日，江都是其政治上走向成功的起点，也是他感情维系之处，他在诗中曾多次称扬州为“旧镇”、“旧处”，说“扬州旧处可淹留”^⑨。而且，我们不应忘记，他曾在这里作过据梁陈旧地而王的政治准备。当他在巩固帝国的活动中连遭挫折、兵败辽东、身围雁门、各地农民起义频繁、豪族举事不断之际，他不可能寄希望于没有势力基础、自己在位时仅有过数月盘桓的西京长安。无论是狐死首丘，还是图东山再起，心理上、政治上的因素都会促使他选择江都。在全国政局难以维持之时，昔日“据淮海，复梁、陈之旧”的政治图谋亦会重现于他的脑际。他“有难色”于回西京的表情及“无复因风力”的哀唱，都证明他到江都是理智的行动。《旧唐书》53《李密传》记李密言：“当今主昏于上，人怨于下，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京都。”同传温大雅《报李密书》亦说：“今日銮舆南幸，恐同永嘉之势”。《隋书》卷70史臣语：“炀帝魂悌气慑，望绝两京，谋窜身于江湖，袭永嘉之旧迹。”当时人的这些言论，或许正好道出了炀帝第三次幸江都的原因和目的。

其次，炀帝信任江淮人士，仰仗“江南兵”，这不仅使他要借其“风力”高举，而且他也绝不可能将他依赖的江淮人带至关中，失去地理上的依托而自折其翼。

炀帝既谋“袭永嘉之旧迹”，对河北、关陇起兵的豪族可以放任不管，却不能不维持江南的安定。他让宁长真以鸿胪卿、安抚大使的身份回到岭南，张镇周隋末唐初也在岭南活动，同宁长真合力抗击萧铣，阻止其向岭南渗透。炀帝还先后遣鱼俱罗、吐万绪、王世充、陈稜等剿灭了以刘元进为首的江东豪族的叛乱活动，致使后来李子通、辅公柘、杜伏威等淮南武装集团能顺利进入江东，而为之驱除的炀帝却因阵营内的矛盾而未能进入江东，再现永嘉之局。

炀帝到江都后，虞世基、裴蕴等江南人士以“昏耄老疾”为由，将苏威排挤出最高领导层^⑩，这无疑加深了本就存在的关陇人士和江淮人士的矛盾。而随炀帝至江都的关陇地区的骁果久客思归，炀帝遂纳裴矩之“奇计”，“括江都人女寡妇以配从兵”^⑪，及李渊入关，“上起宫于丹阳，将逊子江左”^⑫。《大唐创业起居注》卷3说：“炀帝知唐据有西京，过江计定，仍先分骁果往守会稽，诳之云往东吴催米，故化及因之而难作。”炀帝分往会稽之骁果，必为关陇人，若为江东、岭

南人，则欢呼雀跃有之，化及何得因而作难！

炀帝退至江都，似乎还有恢复局势的幻想，及李渊入据长安，“道路隔绝，遂无还心。……由是筑宫丹阳，将居焉。”^⑧但炀帝退守江南的决定导致了其集团内部关陇人士和江淮人士之间矛盾的最后爆发。《隋书》65《赵才传》：

赵才，张掖酒泉人也。……炀帝即位，转左备身骠骑，后迁右骁卫将军。帝以才藩邸旧臣，渐见亲待。……帝遂幸江都，待遇愈昵。时江都粮尽，将士离心，内史侍郎虞世基、秘书监袁充等多劝帝幸丹阳。帝廷议其事，才极陈入京之策，世基盛言渡江之便。帝默然无言，才与世基相忿而出。

虞世基、袁充等江东大族人士主张炀帝南渡到丹阳，即原梁、陈旧都建康，无疑是打算拥炀帝复梁、陈故迹，重振自己因陈亡而没落的家声，而这是和关陇人士的利益不相容的。炀帝默然不语，实同渡江之计。于是，左屯卫将军宇文文化及与“总领骁果”的武贲郎将司马德勤、元礼、直阁裴虔通、内史舍人元敏等关陇人士利用关陇骁果“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的情绪，结党谋乱，并欺诈骁果说：“陛下闻说骁果欲叛，多酝毒酒，因享会尽酖杀之，独与南人留此。”^⑨以激起关中骁果对“南人”的仇视和反抗情绪。

当司马德勤等合谋举事时，江南人士也有所察觉，并试图反击。《隋书》67《裴蕴传》：

及司马德勤将为乱，江阳长张惠绍夜驰告之。蕴共惠绍谋，欲矫诏发郡下兵民，尽取荣公来护儿节度，收在外逆党宇文文化及等；仍发羽林殿脚，遣范富娄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萧矩及燕王取分，扣门援帝。谋议已定，遣报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实，抑其计。须臾，难作。

结果炀帝身首分离，虞世基、袁充、裴蕴，来护儿、许善心等“南人”尽皆遇祸。虞、裴等终未成炀帝之顾荣、贺循，历史也幸免又一次可能出现的南北分裂局面。

宇文文化及杀炀帝，旋领骁果北上。右御卫将军、庐江人陈稜奉命留守江都，“集众缟素，为炀帝发丧，备仪卫，改葬于吴公台下。衰杖送丧，哀感行路，论者深义之。”^⑩化及即将北上时，“南人”还进行了一次流产的反抗。“自以荷恩深重，每怀竭命之志”的麦铁杖之子、“领江淮之众数千”的武贲郎将麦孟才，“及江都难作，慨然有复仇之志”。与武牙郎将吴兴钱杰“遂相与谋，纠合恩旧”^⑪。而折冲郎将吴兴沈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怀竭节”，也“潜构义勇，将为帝复仇”^⑫。结果谋泄，麦孟才、钱杰被捕杀，沈光率兵击斩元敏，“麾下数百人，皆斗而死，一无降者”^⑬。

由于骁果来源不同，江都事变时，一部分江南骁果便奔还江南乃至岭南了。《旧唐书》59《丘和传》：“会旧骁果从江都还者，审知隋灭，（宁长真等）乃以州从（萧）铣。”被裹挟北上的江淮骁果在宇文文化及与李密决战的关键时刻，复委之而去，致其惨败。如汪钱先生所说：“宇文文化及之士马日散，虽在于未能夺取仓库所在之黎阳，而其要亦由于所拥徒众各自离德也”^⑭。

史学前辈陈寅恪先生曾精辟地指出，西魏、北周以来在“关中本位政策”指导下形成的关陇统治集团，在隋和唐前期一直垄断着高层政治。这一观点也为史学界大多数人所接受。随关陇集团成为统一帝国的上层阶级，“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只得“自号膏粱华胄”^⑮。东晋南朝特别是梁陈时的统治阶层也丧失了昔日的地位。

但是，远在陈先生所说的关陇集团在武则天时代因新的社会阶级冲击而崩溃前，这一集团已受到各方面的影响。从该集团内部看，其上层人物常和皇权发生冲突，仅隋文帝时就发生过多次废黜他的密谋，该集团中许多上层人物因而见杀或被贬斥；从外部看，关东和江淮大族人士也以各种方式谋求自己在新政权中的政治地位。在北周末尉迟迥和炀帝初杨谅的起兵事件中，

我们可以看到“东人”的活动,在本文前面的论列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江淮人士在杨帝“夺宗”活动及杨帝朝政治生活中的活动情况。

隋统一帝国存在的二十多年中,无论是文帝还是杨帝,都未能将政权向各方人士公正地开放,政治的统一没有建立在各方上层人物同心同德的基础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正是隋统一政权迅速解体的原因。

注 释:

①③④⑥ 《隋书》45《文四子列传》

②⑩⑳㉔㉕ 《隋书·杨帝纪》

⑤ 《资治通鉴》,隋开皇二十年八月记文帝语。

⑥⑦⑳ 《隋书》36《宣华夫人陈氏传》

⑧ 《隋书》54《元亨传》

⑩ 《隋书》66《陆知命传》

⑫⑬⑭ 参《隋书·文学列传》各人本传

⑮ 《续高僧传》13《释慧觉传》

⑯⑰⑱ 《续高僧传》11《释吉藏传》

⑰ 《续高僧传》23《释慧乘传》

⑱ 《续高僧传》11《释智矩传》

㉑ 《续高僧传》11《释辩义传》

㉒ 《全隋文》卷5引《大业拾遗记》

㉓ 《隋书·文帝纪》

㉔ 《陈书》28《陈叔坚传》

㉕ 《颜氏家训·风操》:“今在议曹,共平章百官禄秩。有一显贵,当世名臣,意嫌所议过厚。齐朝有一两士族文学之士,谓此贵曰:‘今日天下大同,须为百代典式,岂得尚作关中旧意!’”

㉖ 《隋书》66《柳庄传》

㉗㉘㉙ 《隋书》67《裴蕴传》

㉚㉛ 《隋书》67《虞世基传》

㉜㉝㉞ 《隋书》64《沈光传》

㉟ 《隋书》42《李德林传》

㊱ 《隋书》61《宇文述传》

㊲ 《隋书》61《郭衍传》

㊳ 《隋书》39《阴寿传子阴世师附传》

㊴ 《资治通鉴》唐武德元年十二月条

㊵ 《陈书》27《姚察传》

㊶ 《隋书》58《许善心传》

㊷ 《隋书》64《麦铁杖传》

㊸ 《隋书》64《来护儿传》

㊹ 见杨豪《岭南宁氏家族源流新证》,《考古》1988年第3期。

㊺ 《资治通鉴》唐贞观二年记魏征语。

㊻ 参见《隋书》41《高颖传》、52《贺者弼传》。

㊼ 《隋书》70《杨玄感传》

㊽ 载《全唐文》171

㊾ 参逮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三》杨帝《江都官乐歌》、《泛龙舟》等诗。

㊿ 《隋书》41《苏威传》

① 《隋书·五行志上》

② 《隋书》85《宇文文化及传》

③ 《隋书》64《陈稜传》

④ 《宇文文化及之杀杨帝及其失败》,见《汪篾隋唐史论稿》。

⑤ 《唐会要》83《婚娶》

(责任编辑 吴友法)